

2025
年度盘点

2025年度散文创作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作家们将自身的生命体验深度融入创作,无论题材涉及地域、历史、文化、自然还是生活,字里行间都跃动着鲜活的个人生命力。散文创作在打破文体边界的同时,完成了一次向大地、向生活、向内心的集体回归。这或许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在这个被算法、流量与不确定性切割的时代,创作者们本能地寻求“确定性”,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通过扎根现实的行走、对世间万物的凝视、与他人的共情,来确立一种精神的坐标。在这个意义上,2025年度散文创作的核心价值,在于以“真实”为轴心,在文化传承、现实观照与未来忧患的多重维度中,为碎片化时代提供了可感知、可依托的精神着力点,彰显了散文文体独有的赤诚与力量。

于地域肌理中唤醒文化记忆

地理是空间的容器,亦是时间的褶皱。在对地理空间作细致描摹的基础上,打捞被时间遮蔽的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是在地写作的基本特质;而从这些地理与人文的遗产和智慧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内核,则是在地写作的终极追求。江河书写是地域记忆书写的典型样本。阿来的《大河源》与胡性德的《大江流》,在江河题材的写作中均展现出创作上的突破与成熟。两位作家分别用自己的特有视角,挖掘江河背后蕴藏着的自然、人文历史与时代印记,让笔下的江河不仅是地理符号,更在记录文化与社会演进的维度上,有了更深厚的意义。在《大河源》中,阿来写黄河源的草木,写冰川的消融,写游牧文明遭遇现代性冲击之下的变迁。他不仅是在写水,更是在写水的“命运”。胡性德则将目光聚焦于长江流域的人文与变迁,他笔下的长江流域是商贸的通道,是移民的路径,更是无数普通人的生存之所系。这种文明溯源式的书写,契合了现代漂泊者的精神诉求,为我们追寻失落的文化根脉、确立精神归属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指引。

地域书写的另一重维度,是对苦难记忆与精神韧性的挖掘。刘庆邦的《挖河记忆》是一部内身劳作的苦痛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无数人的青春都挥洒在了治淮工程的泥泞里。刘庆邦没有回避苦难,但他更着重于书写苦难里的韧性。他写铁锹与泥土的摩擦,写饥饿与体力的透支,这是一次“挖潜”——既是疏浚河道,也是抢救湮没的记忆。而梁晓声的《陕北道情》以及陈彦的《活在秦岭南北》,则表现出地域文化对于人的深刻塑造。梁晓声笔下的陕北,不仅仅是黄土地,还是一种苍凉而倔强的精神气质;陈彦笔下的秦岭,则是一道巨大的生态与文化分水岭。作为一个生活在秦岭脚下的作家,陈彦将秦岭南麓与北麓的生活经历与山脉的生态变迁、人文积淀相结合,笔下的草木与日常不再是孤立的风景,而成为携带民族基因的文化共同体,以此完成了从地理标本到精神坐标的转化。

地域书写并不局限于荒野,城市生活也是地域文本。冯骥才的《清流:五大道生活》打捞天津五大道的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书中既描摹小洋楼的建筑肌理、家族兴衰的温情片段,也定格文人们旧事与独特的生活格调,让五大道由地理符号变成承载中西文化交融的精神载体。“清流”二字既代表对雅致生活的眷恋,更体现着喧

散文

记忆为根,生活为壤,未来为光

□王清辉

◆回望2025年,散文作家们以扩大写作的经验版图为目标,有意识地跳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将笔触延

◆这一年的散文书写,清晰呈现出一条从“自我”走向“世界”、从“书斋”走向“大地”的创作轨迹。在散文这种近乎赤诚的文体中,我们能真正听见大地的呼吸,感知生命的体温,以此在时代的洪流中,为自己留下一片可以安顿灵魂的“方寸之地”

嚣时代里的精神坚守。于坚的《挪动记》串联起山河行旅与精神求索,也记载了从故土到新境的生活转换。地域文化对个体精神的塑造,体现在登临泰山、寻访古茶山的路途中,更体现在器物的挪动、邻里之间的交往、对环境点滴变化的适应过程之中。

在宏大的文化重构之外,桑格格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写作。她的《打泉水去》收入一系列人物速写,落笔于身边的邻居、茶友、父亲等人,写他们摘樱桃、做陶艺、打泉水等日常片段,成为身边人与地域及其生活哲学之间的纽带。地域特色在她的笔下化作可感、可触的人间温情,深情与暖意散落在文字中自然流露,读来不难感受到其中所暗藏的文化内核与自我确认的深意。

本年度的在地书写以具体地域为切入点,挖掘其中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内核,最终指向的是对根脉、记忆、家园的普遍性追求。

在万物共生中重构生命认知

生态写作旨在跳出人类中心的视角,在文字中重构人类对自我、对自然、对生命共同体的认知。2025年的生态散文写作仍保持着较高的热度和关注度。这些作品通过描摹山川湖海、花鸟草木的生长节律、生存状态,将个体生命体验与自然生态深度交织,在反思与唤醒的基础之上,充分挖掘自然所蕴藏的智慧。

生态记忆的书写是本年度的重要收获。周蓬桦以对东北森林、草原的荒野观察与乡土记忆为底色,在《乌乡薄暮》中,铺展成一片以松针、雪野、生灵与小人物日常为脉络的精神原乡。薄暮意象贯穿始终,既写草木清香、大地风物,也饱含对生存韧性的悲悯与对生态命题的省察。艾平的《天生草原》则写出了对呼伦贝尔大草原血缘式的深情。无论是草原的四季变化,还是牧民与牛羊的相处之道,乃至整个草原生态的脆弱与坚韧,都浸润着作者的敬畏和热爱。

生态散文的突破还体现在从“观察”到“行动”的实践转向。在吴琦主编的《我看见了鸟》与花蚀的《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中,对自然的观照,化作了能介入公共领域、产生实际影响的行动力量。《我看见了鸟》以飞鸟为媒介,汇集六位作者的观察,跨越盈江犀鸟谷、潮汕湿地等多个场景,既捕捉生命本真、赞叹自然之美,也共情物种生存艰辛,将个人体验与生态思考相融。《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则跳出单一动物书写视角,既聚焦濒危动物、普通鸟类等物种的生存状态,也记录科研人员、巡护队、村民等守护者的实践与困境,将物种保护与人类生存、发展需求交织呈现,拓展了生态写作的议题宽度。

山水书写的哲学维度进一步深化。王必胜的《在乎山水间》与沈念的《山海经纬》试图从山川

湖海中寻找到现代人丢失灵魂的栖身之地。叶梅的《能不忆江南》和巴燕·塔斯肯的《克兰河畔》构成了一次有趣的江南水乡与西北边疆的对位:叶梅笔下的江南,在现代化的冲击中依然保有某种温润的生态底色;而巴燕·塔斯肯笔下的克兰河,则流淌着游牧民族的生命之血。

从生态伦理的视角来看,本年度的生态散文完成了从审美到生态责任的转型:作家们不再仅仅赞美自然之美,更强调人类作为生态共同体一员的责任与担当。

在漫游求索中拓展精神边界

如果说在地与生态代表了向外的探索,那么走读式写作则提供了一种在漫游中向内的回旋。它将日常所见所感与精神思考熔铸为一体,尤为特别的,是将学术思考嵌入个体经验,在碎片化的生活流变中,敏锐捕捉自己与世界隐秘而坚韧的联结。这样的写作打破了书斋的局限,让文字长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中,不仅是散文写作的新收获,而且极大地拓宽了文字的精神空间。

“60后学人随笔”丛书是这一探索的集中展现,丛书收入李怡的《我的1980》、赵勇的《做生活》、王兆胜的《生命的密约》、王尧的《你知道我梦见谁了》、吴晓东的《距离的美学》、杨联芬的《不敢想象》等,将学人的学术思考与人生体验深度绑定,为知识分子的定位提供了鲜活范本。其中,赵勇的《做生活》尤为典型,他试图为知识分子的生活重新下定义,“做生活”既是“过日子”的方言表达,更是“做学问”的重新阐释。他将学术之旅与人生行旅结合起来,在山西农村的蹲点调研、与师长朋友的交往畅谈中,走读中的既写草木清香、大地风物,也思考的源头活水。这也再次印证了一代学人的学术选择从来不是在真空里的决策,而是时代的洪流、家庭的责任、个人的理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赵勇的书写聚焦于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与学术道路上的选择,那么格非的《云朵的道路》则直面更普遍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他借用穆齐尔的说法,以台球与云朵的轨迹为隐喻,对道路的选择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总试图像控制台球一样,让生活按预设的路线前进,却忽略了人生更像云朵,会因风向而改变方向。这一隐喻准确地击中了现代人被“确定性焦虑”所裹挟的困境,“学做云朵”的呼吁正是一束澄澈的哲学之光,照亮了人们挣脱执念的精神之路,也为在碎片化时代里寻求心灵安顿的个体,提供了一份与不确定共处的生存智慧。

时间与存在的哲思,在这类创作中得到集中呈现。龚曙光《寓言之岁》是厚厚的一本时间之书。他采用日记体形式,在这一年里把人生看作“寓言”,从生活的体悟中,得出有关存在、衰老以及命运的哲思。张翎的《赤道风语——非洲漫行

散记》记录异域生活的所见所思,提供了打量世界的“他者”眼光,在跨文化碰撞中深化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韩浩月的《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则以回望故乡、亲人的方式,为逝去的时间立碑,在记忆的打捞中完成精神溯源。王彬彬的《废墟与狗》则是一如既往的犀利,他的文字像手术刀一样,善于从文化的废墟里发掘出被遮蔽的事实。

对于精神边界的探寻与拓展,在郁元宝、李洱、朱强等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向上的延伸。不论是《生涯锁记》中人生回顾与地域转换之间精神成长的关联,还是《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里对时代精神肌理的观察,或者是《行云》中将行走中的山川景观与内心的精神追求相呼应,这些写作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让文学在行走的体验中,延展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

年逾九旬的谢冕先生2025年集中推出《为今天干杯》《碎步留痕》等多部作品集,令人感叹不已。他在散文中写美食、写美酒、写花开花落,字里行间洋溢着赤子般的天真和热烈。这种生命姿态本身就是一道超越年龄、照亮未来的“赤子之光”。

新大众文艺:写作与生活的双向奔赴

在2025年度的文学版图上,最动人的亮色莫过于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它通过共创共享突破创作边界,让普通人成为文艺生产的主体。新大众文艺的一大特质,便在于对平凡生活的真诚凝视。王计兵的《把平凡的生活烟火编织成诗歌》、王晚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王瑛的《擦亮高楼》、扎十一惹的《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等,正是这一文艺形态中的典型代表。他们以不同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自身职业经历中汲取灵感,用质朴的表达还原生活本真,共同勾勒出新时代大众写作的鲜活图景。

王计兵的《把平凡的生活烟火编织成诗歌》立足其作为外卖诗人的创作实践,叙事从劳作日常中提炼诗意的写作之路。他从做捞沙工、外卖员等工作经历出发,找到了在日常奔波的碎片时间里用语音记录灵感的方法,从而提出生活与爱好相融的创作理念。这份扎根生活的创作实践,和他的作品一样,没有华丽辞藻,却以野生、原始的力量呈现出专业作家难以触及的社会肌理。同样是写外卖员的生活,王晚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集中于她最近一年的工作生活。作为一名咬牙选择了跑外卖职业的女骑手,她在外卖配送途中的细碎日常,订单的催单提示音、街巷里的阴晴雨雪、与顾客的短暂交流等,都被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文字,让我们得以窥见外卖骑手的真实生存状态。

■短评

小切口,大题旨

——评齐建水长篇小说《粮安天下》

□李掖平

国家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宏大主题,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都极具挑战性。它不仅需要紧扣“民以食为天”这一亘古不变的生命信条,更要在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命的微观体验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令人欣慰的是,当我读完齐建水的长篇小说《粮安天下》以后,“惊艳”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部作品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粮安天下”这样一个看似宏大的命题,巧妙地落入了日常的情境中,落到了大地的根基上。作者没有简单地图解国家粮食政策,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命运,展现了粮食安全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深远影响,以及这种变迁对普通人心理世界的救赎与提升。在叙事手法上,作品摒弃了常见的对话推动模式,转而采用生活场景的自然转换和人性发展的内在逻辑来推进情节。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小说不仅是对国家粮食政策的回望,更是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发展历程的一次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文学礼赞。

具体而言,这部作品的可取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小角度与大主题的辩证统一上展现出高超的叙事智慧。作者以“粮食——国之大事”为创作主旨,却没有陷入宏大叙事的窠臼,而是选择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入手,经由细微的人情、人性在日常生活

的缝隙展开叙事,通过描写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起伏,自然而然地托举起国家粮食安

王瑛的《擦亮高楼》书写“城市蜘蛛人”的工作与生活。作品细致描绘高空作业的惊险,也记录了工作中的种种“小确幸”,并对工作的价值进行了反思,在朴素的文字背后,是她对这份职业的热爱。韩云的《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以民间入殓师“大了”的视角,讲述她亲历的生命与死亡的故事。这份鲜为人知的职业及其家族传承史,让我们在一个个直面死亡的故事里,时时看见闪耀的人性光芒。在作者看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生活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的节点。这份生死笔记既饱含乐观精神和慈悲情怀,又赋予死亡以充分的尊严。

在职业书写完成现实记录的同时,新大众文艺进一步深入到自我认知的生长。扎十一惹的《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写就了一部鲜活的边地女性成长史。她从寨子出发又回归寨子,既记录了

两代彝族女性在苦难中的坚韧,也写下了在城乡迁徙中个体的心灵震荡。她的创作将自我认知的成长与对生活的眷恋联结在一起,因此自带情感共鸣的力量。她的文字虽朴实无华,但因为情感的真挚而有了千钧之力。

王计兵与王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写作,从为自己写作扩展到为同路人发声,写作成为他们照亮他人的一种方式,而生活的广度又不断拓展着他们的写作视野。扎十一惹和韩云通过写作敞开心扉,将女性的成长困惑记录下来,成为其自我救赎与内心成长的途径。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大众文艺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它实现了写作与生活的双向奔赴:生活为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与能量,那些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文字,带着原生的质感与温度,成为散文创作最鲜活的养分;写作则让平凡的生命获得了被看见、被照亮的价值,让每个普通个体的故事都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2025年的散文书写,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从“自我”走向“世界”、从“书斋”走向“大地”的创作轨迹。在AI应用日益泛化、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愈发模糊的当下,创作者们以最原始、最笨拙也最诚实的方法——行走、观察、体验、书写,来捍卫文学的核心价值。他们向读者传递的是:肉身的感受是真实的,土地的纹理是真实的,具体的爱与失去同样真实。由此留给我们一条宝贵的启示,那就是在散文这种近乎赤诚的文体中,我们能真正听见大地的呼吸,感知生命的体温,以此在时代的洪流中,为自己留下一片可以安顿灵魂的“方寸之地”。正如姚瑶在《反复被海水淹没的孤岛》中所喻,每个真诚书写者都是文字海洋里的岛屿。那些对过往经验的重述,对当下生活的感喟,对未来可能的追问,终会汇聚成穿越时空的光亮,一同照亮更辽远的人生与天地。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创作研究处处长)

《西湖》《百花洲》《民族文学》《芒种》《万松浦》: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织中重建自我

□叶紫玲

在现代语境中,文学作品中的自我常常呈现出分裂的倾向,如鲁迅《狂人日记》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中审视自我,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现代自我在多重关系的异化中崩塌……近期文学刊物中的诸多作品,多将“自我”置于历史记忆和复杂的诸多关系中,关注个体如何发挥自身主动性,重建自我。

在历史记忆中,个人的认同和选择往往与宏大的历史相关联。王开的《草帽顶记事》(《民族文学》2025年第12期)在叙写怀兴地区乡村振兴建设的同时,也讲述了草帽顶及其周边抗联遗址发生的故事。小说将当代以谭群众为代表的乡村振兴实践者,与历史上以辰生为代表的抗联战士并置,诠释了理想信念在不同的时空下以不同的方式对个体自我的塑造。在王开清的《戏神》(《芒种》2025年第11期)中,塞戎在日军侵略的背景下,从艺术竞技变为个人抉择和家国命运的隐喻。“戏神”韩留根的成长与死亡,将塞戎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结合,展现了传统文化与民族救亡的结合。

作家将自我放置在历史中考察时,不仅揭示了历史对个人的塑造,也关注到个体的鲜活与复杂。杨本芬的《和彭齐周的邂逅》(《万松浦》2025年第6期)关注到知青群体中的“伤痕”,以温情的叙事展现历史中鲜活的个体。李立泰的《过秋》(《芒种》2025年第12期)以极具生活气息的笔触,描写了人们在公社劳动中的种种秋收趣事。“我”勤劳能干且恪守原则,和居大牙等人偷拿棉花、玉米等行为,四叔、三歪因为贪吃馍馍闹肚子

进了医院形成对比。即使“我”如此道德自律,在面对肉包子时也会产生想要带给母亲的念头,这些正是复杂自我的生动体现。

自我的建构与历史记忆有关,也在与现实复杂的人际关系与交互中形成。在作家们的笔下,人们在和欲望与创伤的周旋中,实现自我的和解并从中获得成长。在2025年第11期的《西湖》中,作家多关注到个体成长中的创伤。单甯的《杀猪》写失聪的少年不断成长,听见自我的声音;沈轶伦的《竹筏顺流而下》书写主人公寻找母亲,在记忆的河流中顺流而下,与创伤和解;惠兆军的《怪物死亡的原因》描写失业的中年人何如异化为蜘蛛,希望自己能够网住所有人,却被家人嫌弃和驱逐,宿命般地被小孩踩死。龙焱的《落日计数器》(《百花洲》2025年第6期)不厌其烦地写周溪清洗、切配食材,接送女儿和打扫卫生,谈及婆婆的烹饪指导和丈夫的冷漠等细节。而到山顶上看日落则成为周溪对抗婚姻生活的无意义和确认自我的方式。杨遥的《双猫记》(《万松浦》2025年第6期)结尾“高卫东忽然觉得找到了想找的那种猫”,何尝不是找到了从前快乐的自己。

现代的自我,不是传统社会中稳固的、坚硬的、本质化的自我,而是一个在不确定的关系网络中不断生成的自我。作家们通过书写,展现出个人可以在社会洪流中发挥创造性,构建更好的自己。自我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也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叙事方式。作家在书写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不同的技巧,来表达自我的分裂与整合,呈现自我的建构。如齐东的《天桥上的一天》(《万松

浦》2025年第6期)用戏谑的语调叙述荒诞的故事,解构了文学权威和写作本身,揭开写作者的精神困境。李蔷薇的《异色梦》(《百花洲》2025年第6期)频繁让人物的思想、感觉和回忆进入叙事,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讲述了阿罗在泰国与变成首富的前任相遇,在这段经历后阿罗重新找到自己,回归本真。齐东的《东照岛》(《百花洲》2025年第6期)通过信件、日记、小说还原一个养鸭人为何疯癫和如何死亡,省思现代人的创伤和焦虑。

在结构和叙事的控制上,作家们也独具匠心。《草帽顶记事》采用双线并行结构整个小说,一条线索是怀兴的乡村振兴,另一条线索是辽东自卫军和抗联战士的个人回忆。《和彭齐周的邂逅》选取历史中的一个横截面,关注生产队中一个残疾的年轻人。这些小说通过叙述中的留白展现自我如何在城乡变化和他人目光中被影响。

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能够讲述一个个关于寻找自我、建构自我的故事,即讲“好”故事,更能通过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讲好”故事。怎样讲与讲什么同样重要,它们共同完成了对关于自我固有认知的突破,发现塑造自我的隐性的社会规则,呈现自我所处的错综复杂的世界。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

